

梁披雲先生九五華誕 紀念文集



澳門文化研究會

2001年3月

〔澳門文化研究會彙刊之三〕

梁披雲先生九五華誕
紀念文集

澳門文化研究會

梁披雲先生九五華誕紀念文集

劉月蓮／黃曉峰編校



澳門東堡電腦排版公司排版

澳門華輝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中西文藝出版社出版

大 16 開 · 21 x 29cm · 180 頁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澳門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定價：60 澳門圓

ISBN: 99937-629-0-3



九五感詠

人生如夢豈忘常
俯仰浮沈祇自傷
許國空餘心一付
求仁如作夢千場
江河浩上乾坤大
泰華心期歲月長
壯志平禱利如仇
高歌一曲向朝陽

一月十一日
梁披雲先生作

梁披雲先生今年1月11日於澳門山頂醫院做脾折手術後所作〈九五感詠〉手書（放大一倍）

關於梁披雲大師（代序）*

《文化雜誌》能為文化學術界人士作出突出而公正的評價深感榮幸，因為即使集所有贊美之辭，也不可能反映學術界精英的全貌。我們在此尤有所指，那就是關於梁披雲大師。作為華人文化傳統所塑造的一位當代文化界著名人物，他具有文學和藝術的超凡魅力和無私美德。梁披雲先生是人材匱乏的今天從未受到過度贊美的一位謙謙君子。

我們澳門為擁有如此一位奇才而深深感到榮幸。我們衷心祝賀他安享耄耋之年。他的一生充滿着艱難險阻，其業績卻閃耀着熠熠光芒。

他具有超人般的精力。他曾經擔任過記者、編輯、多種知名刊物的主筆和創始人，並且，作為研究員、詩人、獻身社會公益事業的積極分子和致力於歷史政治問題研究的觀察家、以及為教育事業作出不懈努力的社會活動家而展示了一位文化人的高大形象。他曾擔任過幾所著名大專院校的校長之職，成績斐然，有口皆碑。此外，他的卓越作用早已被海外華人社團所認同。在本期《文化雜誌》儘管有限的篇章裡，我們亦從三個方面顯示了梁老先生在文化圈的突出作用。

首先，梁披雲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就人情常理與哲學觀點而言，梁披雲先生深知一個民族的財富之最大源泉在於教育。所以，他以方向始終如一的，猶如北極星那樣明亮而確定地倡導教育事業。在上〔前〕一個世紀，斯圖爾特·米爾（Stuart Mill）曾經竭盡全力喚醒美國，因此，被西方和當今新工業時代所重申的真理使社會認識了：一整代人的教育錯誤，往往有可能病變而釀成下一代人的政治悲劇。

我們可以說，在最近幾十年間，全世界似乎並沒有注重於致力從事人類理想的崇高事業。在第二和第三個方面，作為藝術家，梁披雲先生的書法藝術令人傾倒，風格遒勁，表現強烈。他的抒情詩文亦令人折服，格調純正，簡樸古雅。為此，他贏得了全世界關心與景仰他的有識之士的敬佩。

《文化雜誌》總編輯

官龍耀



* 本文係轉載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7-28期（1996）〈編者前言〉一文有關文字。該期中文版首先刊出〈梁披雲詩文品評特輯〉（該刊葡文版於第29期、英文版於第34-35期先後刊出），由總編輯官龍耀（Luis Sá Cunha）撰寫的〈編者前言〉。官龍耀亦為澳門文化研究會創會顧問（創會顧問尚有澳門歷史學家 Manuel Teixeira 即文德泉神甫、澳門耶穌會會長 Guilherme Valente 即呂碩基神甫、前澳府文化顧問 Luís Sequeira 即華聯達等居澳葡籍專家）。本紀念性文集引用一位澳門文化研究家、澳門文化研究會的葡籍友人基於他對梁披雲先生的深刻認識和由衷敬佩而寫的評論作為〈代序〉，想是相當客觀和相當得體的，也是值得拜讀和傳為佳話的。



梁披雲先生少年時代（16歲）臨書手蹟

此件係由梁披雲先生的堂弟梁鴻基先生收藏。其攝影件背面寫道：“家藏雲公兄長冠年手書帳眉。拍照寄來。附詩：寶墨度藏五十春，古香古色倍堪珍。冠年手筆安能再，拍照寄呈表寸心。披雲兄長晒存。弟鴻基（鈐印）寄贈。癸亥蒲月。”

目 錄

關於梁披雲大師（代序）	Luis Sá Cunha	0
回憶青少年時代和龍光大哥	梁靈光	1
1991年1月29日在黎明大學全校教職工會上的講話	梁披雲	11
黎明大學新校區首期工程竣工慶典致辭	梁披雲	17
黎明大學新校區首期工程竣工慶典致辭	李尚大	19
致衛蘭函（附手書）	梁披雲	23
廈門大學授予披雲先生名譽教授贊辭	鄭學檬	29
澳門大學授予梁披雲教授名譽博士學位贊辭	鄧國光	31
在澳門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典禮上的謝辭	梁披雲	33
不斷努力 跟上時代		
——澳門福建學校建校十週年祝辭	梁披雲	35
澳門中葡文化青年研習會成立典禮書面賀辭	梁披雲	36
我的祝願	季羨林	37
《中國書法大辭典》序（手書）	梁披雲	39
贈權昌倫七絕詩（手書）	梁披雲	44
《中國書法大辭典》韓文譯本序言	梁披雲	45
《梁披雲書法集》序	饒宗頤	47
《雪廬詩稿》序	潘 受	49
《雪廬詩稿》（國內版）序言	季羨林	51

《澳門港與海上絲綢之路》序一	季羨林	53
《澳門港與海上絲綢之路》序二	姚楠	55
《澳門港與海上絲綢之路》自序	陳炎	57
《澳門港與海上絲綢之路》編後記	黃曉峰	61
珠江口自然歷史地理與澳門	施存龍	63
澳門港與珠江三角洲	梁振興	77
明末清初澳門的中國海商	聶德寧	83
論 17-19 世紀初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形成和發展	莊國土	91
澳門：中葡交匯之城竣工		
——文化與建築遺產的展望	馬若龍	111
澳門的文化優勢——一個有待開發的寶庫	魏美昌	117
澳門啟示錄	徐新	125
青少年社會問題的思潮因素及對策	鄧思平	127
古語及方言詞拾零		
略論《蕙風詞話》與《人間詞話》二書的際遇	譚世寶	131
	鄭煒明	137
墨汁		
澳門土生文學的兩個文本	馬若龍	141
——馬若龍創作的〈玉墜〉和阿德收集的〈中國新年〉	劉月蓮	143
永遠的庇山耶		
——為澳門庇山耶塑像揭幕而作	高戈	153
跑跑跳跳 快高長大		
——瑪格麗達·利貝露的兒歌創作	李淑儀	157
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與澳門		
閒話美術	徐新	161
	趙紹之	169
澳門塵緣與本土夢境		
——璵茹的洞窟假象藝術與其夫君郭桓的鏤合	黃曉峰	171

回憶青少年時代和龍光大哥⁽¹⁾

梁靈光*

黎明大學第三屆董事會主席

一

公元1916年11月3日（農曆丙辰年十月初八），我出生在福建省永春縣鰲頂村。

永春又名桃源，位於福建省中部偏南，以出產優質煤、柑桔、茶葉、竹籃和醋馳名。從永春縣城的商業街五里街開始，向西北方向沿着石塊鋪砌的官道走8公里，穿過密林修竹的群山，就到了鰲頂村。村落處於群山之間，全村都姓梁。我的舊居座落在鰲頂山麓，背靠高山，左右有兩個小丘，面臨梯田，再前面是一條長年水色清澈的幽澗曲溪，周圍環境優美。

我出生於一個亦儒亦商的家庭。我祖父梁錫永，排行第四，分家時分得蓬壺鎮泉興一家店鋪，經商失敗，商店倒閉。我祖父有兩個兒子，我父親是長子，名仍緒，字繩基，生於1882年5月15日。1899年，取進永春州學士十三名，成了年輕秀才，蜚聲庠序。時值新學堂遍地開設，父親即入福州全閩法政大學讀書，並立下服務社會，當一名新學傳播者的志願。畢業後，入永春梅峰書院（州立中學堂）執教，傳播新學。他好文習經，遍覽文、史、地等方面叢書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著作，手抄名家詩文及所作詩卷字課擺滿几案。

我父親執教兩年後，見家道中落，又目睹苛政、匪害凶橫，民不聊生，他愧於一介書生，無力挽救國難，想通過經商賺錢，以濟民困。於是，棄教從商，在同科秀才黃振倫幫助下，籌集資金，重整旗鼓。由於他較有才幹，寬厚仁慈，豁達大方，深得伙伴擁戴和客戶支持，生意越來越興隆，便將店名“泉興”更名為“金泉興”。店址由蓬壺遷到永春縣城五里街。解放前，這裡是閩南沿海與內陸物資交流重鎮。在北伐軍興起前，金泉興是永春縣四大商行之一。

經我父親和堂伯父繩國的擴展，金泉興在外地有廈門、福州、上海等地分店。外地商號的總聯絡處設在廈門。我父親主要坐鎮永春，堂伯父繩國主要坐鎮廈門，遙相呼應，統籌指揮。其餘分店由各個堂叔父主管。我父親經常穿梭於各地分店之間，出謀劃策，處理業務問題。他和繩國成了家族商業網點的首

* 梁靈光，現任福建泉州黎明大學董事會主席。1916年出生於福建永春鄉間。少年時代受大哥梁龍光影響，勤奮好學，追求救國救民真理，嚮往革命事業，曾於上海求學期間投身“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嗣後輾轉到馬來西亞執教，進行革命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即回國投筆從戎，後加入新四軍，在蘇中敵佔區進行抗日游擊戰爭，開闢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臨危受命，組織華中九分區，堅持發展壯大艱苦險惡的敵後游擊戰爭，率部擴展為華東野戰軍第十一縱隊，上昇到第二十九軍任參謀長。隨後參加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上海戰役，率部隊先行入閩，指揮福州戰役，為祖國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廈門市市長、福建省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浩劫期間，遭誣陷迫害，身處逆境，依然堅守信念，高風亮節。“文革”之後曾出任國家輕工業部部長。後與任仲夷南下推進廣東的改革開放和進行現代化建設，先後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廣州市市長、廣東省省長，對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發展，創立了寶貴的經驗。

(1) 本文係轉錄《梁靈光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一章和第二章（部份），原章節標題略去。此為編者所加標題，僅考慮為了突出引文的主要內容，敬請作者和讀者鑒諒。

領，經營範圍從京菓、糧食、雜貨、絲綢、棉紗、百貨到錢莊。我父親還應好友之邀，於1923年，向馬來西亞柔佛投資開發橡膠園幾千畝，成為永春縣到上海和海外投資的第一人。

父親仗義疏財，慷慨大方。他把做生意積攢下來的錢，多數用來賑濟貧民，廣做善事。除了幫助鄉里支付積欠縣衙門多年的稅款3,000兩白銀外，還承擔全鄉村民每年要繳納的各種苛捐雜稅500兩白銀，並在鄉里設“平糶局”，以濟民食；還捐資修築縣城“交通橋”，方便路人；幫助家用匱乏的教師和昇學無力的青年；在家中辦起私塾，廣收窮家子弟入學；後又辦起“進化小學”（即現永春南陽中學前身）；捐助1,000兩白銀給省立第十二中學（現永春一中）蓋教學樓；補助“勸學所”經費等。他關懷自己店員，店員家有急事、危難需用款，他先代墊付，年底結賬獲足利時，劃作另帳，一筆勾銷。他寬以待人，嚴以律己。與人合伙，總是謙讓別人。他告誡子女說：“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當止，終身不耻。”家庭雖屬富裕，但他自奉甚儉，生活淡泊，也絕不讓子女染上纨绔習氣。

我母親潘密，生於1887年3月11日，於1981年4月去世，是距鰲頂村十多公里的達埔鎮人。她十九歲那年，由她哥哥潘鴻基（我父親好友）介紹，與父親結婚。由於封建意識重男輕女，她讀書少，識字不多，但賢慧達理，精明能幹。她信佛，到泉州定居後兼信基督教，很熱心做善事。早年，家境好時，經常收留鄉中窮人子弟在家吃飯，供他們衣物，對上門求助的鄉親，常常慷慨解囊。她對人仁慈好施，自己卻克勤克儉，經常以鹹菜、蘿蔔為食。有一年冬天，坐轎外出，見一鄰鄉婦女衣衫單薄，冷得發抖，她就脫下自己的衣衫給這位婦人穿。我母親這種熱心助人的精神，至今，鄉親們還津津樂道。

父母生我們兄弟四人、姐妹四人共八人。我排行第五。其中大姐梁瑾及三弟梁侃均幼年夭折。三姐梁勉、四弟梁燁分別於1930年、1991年去世。

在世的尚有：兄，梁拔雲，學名龍光，生於1907年3月15日，任全國政協委員，現寓居澳門；二姐，梁晃，又名蘭芬，生於1911年，現僑居馬來西亞；四妹，梁芷香，生於1920年，現寓居廈門。

我出生時，取乳名舊湛，簡稱湛。“湛”字有深沉、深重之意。上小學時，父親為我起名涵光。到上海讀書時，我哥為我起名靈光，取自孔子“魯殿靈光”，希望我將來有所建樹。

我兒童時代的生活過得輕鬆愉快，常和小伙伴們到山上摘菜捕鳥，下小溪摸魚網蝦。每逢清明節，我們跟着大人，扛着香燭祭品，上山掃墓。祭祀完畢，在祖先墳前，就地鋪開酒菜，一飽口福。每到夏天夜裡，坐在曬穀場上乘涼時，和一群小伙伴纏着伯母，聽她講那些妖魔鬼怪、狐仙虎精之類的故事。她講得離奇古怪，曲折動聽，既刺激，又有趣。我們既愛聽，又害怕；怕過之後，又想聽。

有時，我和小伙伴們玩時，還愛動動腦筋，出出主意，小伙伴們在地裡挖出蕃薯（地瓜），就饒不及待地大咀大嚼起來。蕃薯生吃，容易引起肚子痛。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們玩時，就用磚頭壘起“爐灶”，上面放一塊瓦片，下面

燒火，把蕃薯切成片後，放在瓦片上烤。這樣，烤熟的蕃薯，既香甜，又衛生，小伙伴们吃得十分高興。

四歲（按週歲計算）那年早春二月，我進鰲頂村進化小學。從開學典禮跪拜過文曲星那一刻起，我就成了一名學童，在家鄉讀了兩年。想不到就在這一年，我家突然飛來橫禍。北洋軍閥在閩南的地盤被當地雜牌部隊攻佔期間，永春土匪頭目陳春光受編為團長，進駐桃城。同鄉梁某，想當營長，勾結匪首，於1922年冬綁架我父親，勒索贖身費3,000兩白銀。我父親將永春店鋪存貨消盤，收回欠款，湊足款數，便將永春總店關閉，於1923年春節後合家避居廈門。後來，父親患了食道癌，在日本人開的博愛醫院治療，不見好轉。下半年，合家再遷往泉州定居。父親繼續尋醫吃藥，仍不見效，1924年1月27日，不幸在泉州逝世。去世前，他叮囑兒女說：“有恩定要報，有仇切不可結，更不可父仇子報。”父親去世時42虛歲，我6歲。他樂善好施，急公好義，寬人嚴己，尊師重教的風範，受到民眾好評，也給自己的子女打下了烙印。

我父親英年早逝後，家中經濟從此一蹶不振。母親獨撐家庭重擔，撫育我兄弟姐妹，極顯刻苦耐勞。由於堂伯、堂叔將我家在廈門、上海、福州、泉州等地商店的股份侵吞，我母親每月去商店取生活費都被剋扣，還經常被欺負，這使她非常氣憤。每當她將眼前的情形與我父親在世時的情形相比時，常痛哭失聲。我們幾個小孩圍在她身邊也陪着垂淚。她幾次對別人說過：“我若不是看到這麼多小孩，就自殺了。”母親的慈善、刻苦、忍辱負重的美德，對我影響很大。同時，也激起我對封建宗法制度的不滿。

二

父親作古時，我正和兩位姐姐一起在泉州聚寶街聚德學校讀初小。由於學習認真刻苦，小學時，我的考試成績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因受學校影響，我們姐弟三人都信基督教，還曾為有沒有上帝“耶和華”的問題，和我哥哥展開了激烈的爭辯。初小畢業後，我轉學到泉州培元高小，這也是所教會學校，但我對宗教的興趣已漸漸地消失了。

我從7歲開始，就在商店（也是家）裡，東翻西翻，翻出《三國演義》的石印本，硬着頭皮，似懂非懂地咀嚼它那情節曲折、富有韜略的艱澀文字，從此引起我一發難收的讀書興趣。後來，母親給我零用錢，我就拿去書攤買《水滸傳》、《封神榜》、《七俠五義》、《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等歷史小說和武俠小說。我哥哥給我買本《儒林外史》，我不知如何讀法，先從開頭長篇大論的序言、考證看起，看得頭昏腦脹。後來看到正文寫王冕的事蹟，逐漸品出了味道，使我愛不釋手。哥哥平時買回的書籍雜誌，我也花大量時間將它“消化”。我從小學起對地理很有興趣，自己買了本中國地圖集和世界地圖集，翻來翻去，心裡想幾時也能到國內外去遊覽遊覽。高小時偶然看到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我對他的宏偉構思十分欽佩，也禁不住

浮想聯翩。他所提的建設北方、東方和南方大港以及以蘭州為中心的全國鐵路網絡，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從小大量讀書，增長了我的知識，擴大了我的視野，也為我的文學修養打下了基礎。

課餘時間，我從店裡翻出很多市面上不再流通使用的銅錢，不時拿去向小販換麥芽糖吃，還把銅錢分給十幾個小同學，作為發餉，組織他們分成兩邊，模倣古書中的某些戰例，指揮他們打仗。他們封我為小司令。

隨着歲月流逝，小學快畢業了。一天，母親把我叫到跟前，撫摸着我的頭，對我說：“阿湛，你看家裡這環境，是不是該改變一下呢？”我望着慈祥的母親，知她話出有因，但猜不透她有甚麼想法。她望着我疑惑的雙眼，挑明地說：“你已經長大了，懂事了，要是你能去幫幫叔伯打理店鋪，免得我們家的股份老是被人侵吞，也可以多幫補一點家用。”聽完母親的話，我覺得太突然了。哥哥讀書長年不在家，在母親眼中，他也並非聽話的孩子。姐姐雖比我大，但女人在社會上無地位，更不能在店鋪裡亮相。家庭經濟越來越困難，母親又患肺結核病。堂伯父由於生意不順，又因哥哥和我不去商店幫忙而有看法。他娶了三個老婆，開支又大。由於經濟週轉有困難，我向他要家庭費用時，他遲遲不給。我還和他大吵過一場。母親知道我孝順，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用商量的口吻試探我。答應她吧，我實在太愛讀書，捨不得放下書本，也受過去重仕輕商的影響；不答應她吧，又想不到有甚麼法子能為母親分擔家庭重擔，祇好低着頭沉默不語。

在我的家道起起落落和人生道路就要邁出抉擇步伐的時候，中國大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19年五四運動風暴席捲神州大地。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翻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繼而，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掀起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取得了北伐戰爭的重大勝利。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革命由勝利轉向失敗。共產黨先後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建立工農紅軍，在農村開展了土地革命戰爭。這時候，我雖則年少，但社會的激烈變化，也使我的意識、抱負發生激烈變化。

俗話說，家中無父兄為大。自從父親辭世後，哥哥就是家庭的精神核心。弟妹的言行起止，都圍繞着哥哥的意志轉。我深受哥哥的影響。

哥哥六歲入村塾；九歲入城鎮教會小學；1920年入省立十二中學（現永春縣第一中學）；1921至1922年，就讀廈門集美中學，並為廈門《民鐘報》投稿，因參加集美中學第二次學潮，被學校開除學籍；1923年入武昌師範大學英語系；1924年以第一名成績考入上海大學。

當時的上海大學是藏龍臥虎之地，人材濟濟。校長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副校長是邵力子。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陳望道、沈雁冰、鄭振鐸、俞平伯、李石岑、沈仲九等，曾在此教過書。秦邦憲、王稼祥、張治中、陳伯達、曾山、丁玲等，曾就讀於此。我哥哥受業於該校，對他有很大影響。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哥哥奉上海學聯之命，南下福建、廣東宣傳反英、反日。其間，他曾寄讀廣東大學（現中山大學前身）幾個月，又回到上海

大學，1926年畢業，獲文學士學位。為“師夷以制夷”，實現獻身改造中國，促進中華振興，他苦學日語，於當年夏天，入日本東京日語補習學校學習，並旁聽東京早稻田大學部份課程。1928年，他從日本返廈門，主編《民國日報》。

當哥哥得知母親要我棄學經商時，十分替我擔憂。他歷來重仕輕商，厭惡應付錢財的生涯。他不想讓錢銀將我拴住，也不忍因家庭一時困境而使我放棄學業。但也不願當着母親的面反對，去傷母親的心。他採取先探摸一下我的意思的做法，看能否借助他的影響力，去促使我改變棄學從商的念頭。

一天晚上，哥哥和我關在一間小屋裡。他對我講述他幾年在外經歷的傳奇式故事。從哥哥口中，我知道了帝國主義列強、反封建、烏托邦、五卅慘案、北伐討袁、護國運動、民眾覺醒等等，還知道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中國政治舞臺上的風雲人物和學識淵博的一些學者的名字，越聽越感興趣，越覺得外面的世界富有誘惑力。哥哥見我在默想，忽然，他指着窗外月滿星稀、一望無際的夜空對我說：“阿湛，外面天大地大，你不想去見見世面？”我何嘗不想？我正想說出難以踏出家門的話，哥哥又說：“阿湛，男子漢祇知道臥在自家床頭、灶角，日為兩餐，夜為一宿，不是太無出息了嗎？”哥哥想用激將法促我表態。但我仍默不作聲。哥哥又說：“不登高山，不知山高；不下大海，哪知海深？”這個道理我並非不懂，但目前的境況，使我實在難以下得了決心。我望着哥哥，企望他再講出兩全其美的辦法。

哥哥兜了一晚圈子，最後直截了當地說：“走！我帶你到上海讀書。”哥哥說完，用雙眼盯着我，看我如何作出反應。走，真是說時容易做來難呀！哥哥見我還是左右為難，便沉默了片刻。然後，他又講了一大堆家庭與社會的關係的道理。哥哥講的道理，我並不全懂，但多少能悟出人不但是家庭的一個成員，要為家庭盡義務，也是社會的一個成員，要為國家盡責任。哥哥一晚對我耐心的啟發、開導、激將、規勸，最終還是起到他所期望的作用，使我在人生道路的抉擇中，確定了自己要走的第一步。

當晚，我把要帶的衣服摺好，放入哥哥的行李包底下後，躺在床上，思緒萬千，輾轉難以入眠。第二天，我吃早飯後，揹上書包，就朝學校的方向走去。我走到同哥哥約好的地點匯合，立即乘上汽車到東石，從東石上船，乘風破浪朝廈門方向駛去。

當天中午，母親不見我和哥哥回家吃午飯，心急如焚。聯想起近日我和哥哥常常有意躲避家人，舉動有點異常，她深知自己兒子不會招惹見不得光的東西，但可能在商量和進行着一些不尋常的事情，便懷疑可能是哥哥把我帶走了，因此責怪嫂嫂沒把我盯好。她知道廈門是福建通往外地的大口岸，梁家在廈門有店鋪，估計我和哥哥很可能先到廈門自家店鋪落腳。常言道，知子莫若母。母親最清楚哥哥那種敢下龍潭、敢入虎穴的膽色和脾性，想到他在集美中學鬧學潮被學校開除學籍，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上街遊行，著文演說，曾被華夷巡捕拘禁關內所冒的風險，十分擔心我跟着哥哥瞎闖，會遇到甚麼不測。

翌日，天剛破曉，母親搭車、乘船趕到廈門，走到自家商店，果然發現了

我和哥哥。

我們一時躲來不及，跑又不敢，竟亂了方寸。我像做錯事的孩子那樣，低着頭等待她的責罰。哥哥也抱着聽天由命的態度，一聲不吭，聽憑母親發落。他在外面雖然“野”得出名，但從未試過當面頂撞母親。然而，母親並沒有責罵我和哥哥，而是用協商的語氣，苦口婆心地勸我跟她回家。我理解母親的疼子之心。我和哥哥一旦走後，家中僅剩下姐、弟、妹幾個，勢孤力弱，而母親正患肺病，堂伯父、叔父又欺負她，她是多麼需要我去照顧啊！想到母親對我多年的養育之恩，我深感不安。看見母親在默默垂淚，我的心也在流淚。但我也懂得凡事都得付出代價。我跨出了第一步要走的路，又不願將腳抽回。我的內心充滿了矛盾。

哥哥不願母親將我帶回，怕影響我的前程。性格內柔外剛的哥哥，這時又突然“剛”起來了。他心一橫，對母親大聲嚷道：“媽，你要逼阿湛回去，我就去跳海！”這時，母親心腸軟了。她真怕哥哥動真格，祇好一面擦淚，一面千叮萬囑我和哥哥要好好學會照顧自己，勉勉強強地把我和哥哥送走了。

我揮淚辭別了生我的母親，養我的故鄉，終於邁出了決定我人生方向的第一步。

1930年10月15日，我在〈天邊的白雲〉一詩中，以纏綿的情感，追憶我與母親離別時的情景；又用比興的藝術手法，描述夕陽放出金黃的輝光，正欲歸巢的烏鴉在天空亂噪，我在青翠的茂林中獨自徘徊，悵望碧藍無際的天空。由眼前景色，勾起我的心底情，憶起去年桃花盛開時節，我為了前途，忍心離別慈母。母親一手牽着我，一手代我拿包袱，她的手在抖顫，卻鼓着勇氣送我，祝願我前程自珍重。我在詩的最後兩節對白雲說：

告訴我吧，可愛的白雲，
她是否囑您叫我前程自珍重？
她是否還倚在盛開的桃花下，
悵望着我走遠的方向？

可愛的白雲呵，
請您飛回我的故鄉；
代我告訴仁慈的母親，
我身體無恙，生命正如桃花樣紅！

三

1928年夏天，我和哥哥辭別母親，從廈門乘船北上，到達上海。經過兩個月補習，我考入上海市江灣區的立達學園初中部。

上海是個經濟、文化大都會，經濟繁榮，學府林立。立達中學因執教的人物有着不同凡響的經歷和豐富的辦學經驗，使它在上海頗有名氣。校長匡互生，是五四運動發起人之一，是他不顧生命危險第一個砸開賣國賊曹汝霖的官

邸大門，引進其他同學，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震動全國。他從北京高師畢業後，回湖南任第一師範教務主任，進行教育改革，並打破過去非大學畢業不能當一師教員的規定，聘請一師附小主事毛澤東回一師任國文教員，與毛一起從事革命活動。他淡泊名利，終生致力教育工作。他辦立達的宗旨是：“修養健全的人格，實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會，促進文化。”立達學風開放，學術自由，師生平等，男女生團結互助，思想活躍。這種民主、自由的環境，為我追求知識，探索人生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惜1933年夏匡互生先生去世後，國民黨加強對文教界的反動統治，這種風氣就受到嚴重的干擾破壞了。

立達重視教育與勞動結合，學園裡辦了一個農場，養雞、養蜂、種菜，還在南翔辦了個高中農科。學校還很重視外文教育，除初中、高中都必修英文外，高中每週還教三節法文。我唸了將近兩年。法語教師張志淵看我進展較快，便專門借給我一本法文都德小說集，要我認真閱讀，可惜那時忙於搞革命活動，喜歡看社會科學的書，結果祇讀了幾篇便停了，最後連書也留下沒還，辜負她的一片好意。第二年上學期，意大利駐華使館在立達開辦意文課程，稱畢業後可送去意國留學。我也去參加了，但該使館一學期後又停辦了，到現在，我祇記得老師教的第一句話，即“*Io Sono facisto*”（我是一個法西斯蒂）。

在初中的三年裡，我不問政治，一心埋頭讀書，對語文尤其感興趣。我對衣食住行的開支很節儉，節約下來的錢就拿去買書。我除了學好功課外，還拚命地看課外書。學生宿舍晚上九點半後便熄燈，我就經常偷偷點起蠟燭來看，經常看到十一、二點鐘，有時在上課時還偷偷地看。我崇尚國內外有名望的文學大師，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魯迅的《吶喊》、《彷徨》、《野草》，巴金的《滅亡》、《新生》、《霧》、《雨》、《電》、《家》，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蝕》、《虹》、《子夜》，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高中以後又喜歡閱讀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羅亭》，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白痴》，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蘇聯高爾基的《母親》，綏拉菲莫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這些中外名著，擴大了我的視野，使我的情感不知不覺地向作品中那些社會底層的人物靠攏。從字裡行間，我沒有發現書中的“黃金屋”、“顏如玉”，而是探索到中國和世界歷史的潮漲潮落，從而觸摸到各個時期的時代脈搏。當時，我想從文藝方面發展，寫些詩歌、散文，將來成為作家。

我愛讀書，也喜好體育活動，愛好籃球、網球和乒乓球。我是個球迷，上海每逢有球類大賽，我必到場觀看。那時，一場大賽門票要一塊銀圓。看一場球賽的錢，可買六隻燒雞。為看球賽，我必須節衣縮食。

1929年，哥哥與許卓然、秦望山、張貞諸董事，在泉州創辦黎明高中，他被公推為校長，後又增聘于右任、陳銘樞為董事。哥哥挪移上海商店6,000兩白銀購買教學儀器和圖書。他在〈學校創辦緣起〉一文的結句中寫道：“夜在崩

潰，冬在崩潰，黎明在到來，春天在到來。我們要迎着黎明的光輝，把春天的種子播遍全世界。”黎明高中實行勤工儉學，手腦並用，男女同校，提倡愛的教育和思想自由，甚具開放色彩，是中國號稱傳播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四大學府之一。它把生活和教育、社會和學校、工作和學習結合起來。辦學既深入社會，又提倡卓然出群；既發揮個性，又推行互助協作，是一所具有新型辦學模式和獨特教育思想的學校。文藝名輩巴金、王魯彥、麗尼、吳朗西，生物學家陳範予，史學的楊人楨，音樂學的呂驥，戲劇學的張庚，社會學的衛惠林，理化的黎昌仁，農學的湯文通等，均遠道聯袂來就講席，或考察遊學，或開展革命活動。來自日本、朝鮮等國的流亡革命者，也在黎明得到庇護和棲身。“旗鼓新，壁壘新，挾以俱來之思想見解新”，使黎明的“火種”遍播泉州城，形成了以黎明為中心的“平民”、“民生”、“卓然”、“愛群”等學校群，為福建的教育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20年代末3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發生嚴重經濟危機和政治動蕩。這場全球性的大裂變，也給中國帶來災難。國民黨厲行清黨以後，白色恐怖瀰漫神州。苦惱憂鬱的哥哥於1930年再次東渡扶桑，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大學院（即研究院），研究農業經濟。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我國東北境內的關東軍，在沈陽製造了舉世震驚的“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張學良因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幾十萬東北軍不戰而退，使東三省淪落日軍手中。這時，哥哥輟學回國，積極投身於抗日運動。我的思想也在“九·一八”之後發生了劇變。

日寇對中國的瘋狂肆虐和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使我十分痛心。“九·一八”國恥，使我猛然醒悟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抗日救國對每個中國公民責無旁貸。從這時候開始，我由不關心政治，到逐步關心中國的社情時局和前途命運。

1931年7月，我初中畢業後，回到廈門家裡。我母親認為我身體不好，要我休學一年，我不同意。我哥哥說：“你先去補習一下日語，明年我帶你到日本去。”於是我便進了臺灣人辦的旭瀛書院學日語，一個多月後，“九·一八”事變發生，我和同學們退出旭瀛書院，我在家休學一年。

1932年1月28日夜間，日軍由上海租界向閘北一帶進攻。中國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淞滬抗戰”開始。同年3月1日，日本帝國主義泡製的偽“滿洲國”登場。侵華日軍向華北推進。

哥哥因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妥協，一直在進行反蔣活動。黎明高中成為哥哥及進步人士的反蔣基地。哥哥利用學校和當地的報刊，宣傳民主思想，鼓吹抗日，還參與撰寫閩南一些報刊的社論，字字句句直捅蔣介石痛處。“一·二八”上海戰事停止後，廈門《民鐘報》發表一篇題為〈蔣介石之肉不足食！〉的社論，大快人心。黎明高中的影響日益擴大，同時也得罪了不少親蔣分子和國民黨內的頑固派。黎明高中被迫停辦。

早在1931年，廣州召開西南特別會議，哥哥也應邀參加。其間，曾數度和蔣光鼐接觸。哥哥對這位足智多謀、英勇善戰的名將十分崇敬。憂國憂民的情